

二〇〇五明代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左東嶺 主編

學苑出版社

美雪重觀之無復形跡
遊歸長川之立返
長非之而所寐亦
名保生之可然如
海挽飛鳥以抗策
長非之



責任編輯:郭 强
封面設計:朱京莉

ISBN 7-5077-2700-9



9 787507 727005 >

定价: 100.00元

2005 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左東嶺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2005 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左東嶺主編.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ISBN 7-5077-2700-9

I. 2… II. 左… III. ①文學史-中國-明代-國際學術會議-文集②文化史-中國-明代-國際學術會議-文集IV ①I209.48-53②K248.0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4914 号

出版發行:學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2號院1號樓 100079

網 址:www.book001.com

電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郵購電話:010-67601101

銷售電話: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刷廠:北京朝陽印刷廠

開本印張:787×1092 16開本 45.375印張

字 數:846千字

版 次: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數:600冊

定 價:100.00元

目 錄

“八腳詞”與宋代文章學	吳承學(1)
明代詩話概念述論	孫小力(9)
高啓之死與元明之際文學思潮的轉折	左東嶺(21)
嘉靖、隆慶間的“唐詩選本熱”	孫春青(35)
台閣體、復古派和蘇州文學的關係與比較	孫康宜(50)
明詞的“當代”批評	陳水雲(68)
隆慶、萬曆間的文壇風氣與文學思想的變化	孫學堂(82)
論陳獻章、莊昶的人生態度及其思想的審美傾向	賈宗普(94)
一脈相承而別張壁壘：楊慎與李東陽之詩學比較研究	雷 磊(107)
王陽明的儒商倫理及重商思想與明代中後期文學	陳書錄(117)
黃省曾、黃姬水父子與七子派詩論比較	
——吳中文士於明中葉復古思潮融合與變異的一個側面	鄭利華(138)
嘉靖八才子的分化及唐宋派文學思想的形成	劉尊舉(156)
謝榛與盛唐詩	郭英德(169)
論王世貞的儒學思想	史小軍(182)
晚明文學變奏的政治考察	
——鐘惺、譚元春與晚明黨爭之關係評議	陳廣宏(191)
屠隆與晚明文學思潮	吳新苗(209)
明代松江艷情文學的特點和成因	孫琴安(214)
再論李贄的哲學思想及其文學主張	雍繁星(219)
蒲桃社考論	
——關於公安派鼎盛時期文學及思想活動的考察	何宗美(234)
論袁宏道文學思想的變遷	戴紅賢(255)
楊萬里對公安派性靈文學思想的影響探析	郭艷華(265)
竟陵派選本《詩歸》的特色與詩史地位	裴世俊(275)
明遺民文學元氣論	李 瑄(286)
僧人說夢：晚明叢林夢論試析	廖肇亨(301)
劉宗周思想中的“知言”問題	張敏傑(322)
金聖歎與明末清初周莊戴氏交遊探微	陸 林(335)

論吳偉業“心史”背後的隱秘心曲	張金環(346)
關於《中華大典·明清文學分典》明文學部二編纂情況的三點說明	陳文新 余來明(355)
方孝孺著述考	尹焯明 饒龍隼(362)
日本天龍寺妙智院藏明正德八年《勸世文酒茶四間》簡介	金文京(373)
《明代民歌研究》序	陳美林(376)
唐寅、文徵明文化性格比較論	沈金浩(381)
從奇人奇禍到奇人奇行	
——唐伯虎之傳奇化及其意義(一)	馬宇輝(389)
近二十年徐謂研究綜述	張小李(398)
太倉兩王氏詩人與晚明清初的詩壇流風	姚 蓉(407)
論陳繼儒	張德建(419)
王夫之與明代詩歌	朱迪光(434)
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	李劍鋒(441)
元末明初雜劇斷代劃分異議	王 平(459)
明代《西廂記》研究述論	黃季鴻(469)
《龍泉記》傳奇作者及其佚文	黃仕忠(479)
可解、可觀、可傳——王驥德《曲律》“本色”論略	敬曉慶(489)
《牡丹亭》研究三題	陶慕寧(504)
明雜劇研究文獻三種說略	
——兼談《盛明雜劇》《遠山堂劇品》《群音類選》的不同意義	徐子方(511)
吳梅“以北詞法填南曲”說發微	
——兼論湯顯祖戲曲的“寫作腔調”	程 芸(520)
《嬌紅記》的作者及其小說史意義	陳國軍(527)
關於上海圖書館藏《三國英雄志傳》兩種	中川 論(541)
項羽/ 呂布/ 關羽之敘述的文本互涉	周建渝(549)
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塗抹研究	黎必信(557)
對諸葛亮文化偶像的反思	
——在湖北省圖書館“名家講壇”上的演講	譚邦和(576)
試論《水滸傳》的小說類型定位	
——兼談宋江故事對小說類型嬗變的貢獻	侯 會(586)
《水滸傳》敘事的模糊性	張平仁(597)
世德堂刊西遊記的版本研究	磯部彰(605)
說“一藏之數”	杜貴晨(616)

十七世紀蘇州地區創作與傳播白話小說的文人群落	許振東(622)
閨閣內的情欲導師	
——“三言二拍”中婆子、丫鬟、尼姑的角色作用分析	嚴 明(637)
論三言二拍嬗變過程中所體現的文人化創作傾向	程國賦(648)
凌蒙初的尚奇觀與二拍之奇	傅承洲(659)
從《西湖二集》看小說戲曲在晚明的傳播與接受	魏崇新(666)
中國古代小說一個文化側面的理性透析：	
律令向倫理的傾斜；仁恕對忠孝義俠的屈從	蕭湘愷(678)
附錄：	
一、明代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所提交論文目錄	(701)
二、明代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名單	(705)
後記	(709)

“八脚詞”與宋代文章學

中山大學 吳承學

—

文體的名稱，往往反映出文體的體制或文體用途的某些特徵。在中國古代文體中，異名別稱最為繁雜的恐怕是八股文了。它又被稱作四書文、經義、制義、制藝、時文、時藝、時義、八比文等等。這些不同的名稱都反映出八股文在內容或者形式上的特點，同時也可窺見其源流的複雜性。

在明代，八股文另一個異名是“八脚詞”，這個名稱則比較少為人所知。

明代沈承《即山集》卷四“策”《文體》：

我國家以八脚詞甲乙材杰，格主俳偶，義主訓誥，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繇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名世偉人往往多繇此着脚，而垂世雄文往往多由此下手者，何也？是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為不尋常者也。^[1]

沈承這裏明確說明當時國家以“八脚詞”選拔人材，我們從上下文的語意看，這種“格主俳偶，義主訓誥”的文體無疑就是指八股文。沈承認為，“八脚詞”在明代是尋常文體，但名世偉人却能用這種文體寫出垂世雄文來，因為他們“就尋常體中能為不尋常者”。

另外，明代凌義渠撰《凌忠介公集》卷五《友聲序》：

詞稱八脚，小中現大。作述之際，理數存焉。追聖賢之咳唾，拓豪杰之心胸。時寐然而形喪，尋渙然而神興。此作者之事也；通他心於我心，狀紛糾而難理。眷藹藹以相迎，聳專專而獨語。此選者之事也。^[2]

凌義渠雖然沒有直接用“八脚詞”這個名稱，但考慮到這篇序用的是四六語體，所以“詞稱八脚”，說的實際上也就是“八脚詞”。他所說的“作述之際，理數存焉。追聖賢之咳唾，拓豪杰之心胸。時寐然而形喪，尋渙然而神興。”正是當時人們心目中八股文代聖賢立言的寫作體制與其構思的特點，所以，“詞稱八脚”所指的文體

明顯也就是八股文了。他之所議是關於八股文之寫作與八股文之編選兩方面的高妙與艱難。

那麼，“八腳詞”之稱究竟出現於何時呢？由於文獻有限，我們目前只看到這兩段相關文字，難以準確的判斷，只能是大致地估計。凌義渠和沈承兩位都是晚明人。據《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六：“沈承，字君烈。太倉諸生，少負雋才，工詩古文。一時聲名甚著，然年未四十卒，所著有《即山集》。”^[3]沈承的生平記錄很少，清人婁東無名氏所著《研堂見聞雜記》：“吾婁前故有沈君烈者，名承，亦才士，試輒高等，三居第一，聲價蔚起，四方高才，皆與結社，竟於甲子下第，死。年四十餘，未幾，妻薄氏死，一子襁褓，天如張公，時為諸生，憐而育之。……君烈受知學使毛公，後出撫吳中，知其已死，損金刻其詩文，今《即山集》也，千百年後，猶知有君烈其人者。”^[4]可知沈承和張天如（溥）同時人。而沈承於“甲子下第”應為天啓四年（公元1624年）。而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乙醜（公元1625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李自成衝陷京師，凌義渠自經死。福王時追贈刑部尚書，謚忠清，清廷賜謚忠介，死時52歲。^[5]凌義渠少以制義知名，極為世所傳誦。從上述材料看來，沈君烈與凌義渠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

上述材料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關於“八腳詞”最早的記錄，據此我們可以推定，“八腳詞”之稱至遲在晚明時期（大概是天啓與崇禎年間）已經出現，但在當時似乎是不很流行的說法。不過，到了清代，這個名稱仍有人使用。如清人曹斯棟輯《稗販》卷五“墨義”條云明洪武：“十七年太祖與劉基定制，文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又號八腳辭。”^[6]“八腳辭”與“八腳詞”是相同的。

二

本文的意圖，主要並不在於論證明代人以“八腳詞”為八股文之異稱之一，而在於想通過“八腳詞”這個異稱進一步研究其淵源與文體特點。“八腳詞”一詞雖然不太出名，但却是淵源有自，頗有內涵的，可以說這個名稱透露出八股文與宋代儒學、宋代考試文體聯繫的消息。

從文章學的角度看，“腳”這個關於文章結構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宋代。

宋代儒學與文章學的關係非常密切。^[7]宋儒讀書，講究虛心涵泳，熟讀精思。朱熹主張讀書首先須循序漸進，一本書一本書地讀，每書都要系統地學習，“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亂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復細繹玩味。”（《朱子語類》卷一五）朱熹主張讀書必須反復琢磨，周密思考，虛心涵泳，他的讀書法與文章學是相通的。他對於經典的分析，就經常使用“腳”這個術語。《朱

子語類》中所錄甚多，下略舉數例：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8]

這裏所說的“自作兩腳說”是指“涵養”與“進學”兩方面內容。又如：

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復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腳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9]

這裏所謂“分兩腳說”是指“學”與“耕”兩方面內容。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腳，三句題也要立兩腳，這是多少衰氣！”^[10]所謂“時文”意謂時俗之文，在當時主要是指與應付科舉考試相關之文。朱熹的強烈不滿正好說明講究“立腳”是當時士子寫作應試文章所普遍存在現象。

宋人文章學著作也多次使用“腳”這個概念了，如魏天應編、林子長注的《論學繩尺·論訣》：

吳行可曰：掉頭體似折腰而非折腰，似雙關而非雙關。折腰則緣上意而生語，此不緣上意而別生語。於收拾處方牽上意而入文也。雙關則平分兩腳，意要偶，語要齊，有似破義中以一脚收。此雖兩腳，意不要偶，語不要齊。不須中生一脚，但以下腳收上腳也。^[11]

提起六件事，若分為六腳即太冗直，若分為兩腳即太長。惟是分作四腳，不長不迫。使不知此文格者，不道四個。其與周勳帝某事一也，便道四個，是豈有異於周之言哉？惟公高人，故分作兩腳道，段段變文不同。^[12]

由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論學繩尺》的版本都不是宋人原本，絕大多數是明人所刊刻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論學繩尺》中所用的“腳”會不會是明人根據他們自己的需要和習慣加以改動和增加的呢？當然從版本上可以提出這個疑問。不過，從現有宋代文獻來看，《論學繩尺》所用“腳”一詞，並非孤證，自南宋以後，這種說法有一定的普遍性。當時的時文講究“腳”是有確证的。上舉朱熹之文即是證

據。《論學繩尺》一書所用“脚”一詞，數量非常多，除了在《論訣》之外，在該書注中用“脚”來分析文章的尚有二十多則。而且從上下文來判斷，與原文相當和諧，難以用其它術語來代替，可以看出“脚”是其貫穿於全書分析文章時所使用的基本術語，不可能是後人一時所能竄改的。此外，在其它宋人批點的選本中，也出現“脚”的用法。比如王震霆編、迂齋批的《古文集成》卷四十八錄蘇東坡《三槐堂銘》。在該文“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與“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兩語中間注也有“轉人下一脚”之語。據《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推測，《古文集成》一書的版本應為南宋理宗時代的版本。如此則可證《論學繩尺》所用的“脚”非明人所增改，實為宋人所用的術語。

從朱熹、《論學繩尺》與《古文集成》等評語看來，“脚”是南宋時期文章學的一個常用術語。

三

宋人文章學所用的“脚”一詞的含義究竟指什麼？這個問題我們在引用朱熹的說法時已略作解釋，現再以魏天應編、林子長注《論學繩尺》中的“脚”為例詳加分析。

《論學繩尺》卷二黃萬裏《見知聞知如何》^[13]：

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聖人者為知，而聞聖人者為不知耶？

譬夫帆滄海者知海，處窮谷者未必知。苟知海者水也，則海在吾目中矣。

（筆者按：此為一脚）

廬岱嶽者知山，居汙澤者未必知。苟知山者石也，則山在吾掌上矣。（筆

者按：此為一脚）

親夫聖人者知聖人，後乎聖人者未必知。苟知聖人者道也，則聖人見於羹墻矣。（筆者按：此為一脚）

海者，水之深；山者，石之富；聖人者，道之會也。（原評：以三句總上三脚，文有法度）^[14]

原評中的“三脚”明顯是指“帆滄海者”、“廬岱嶽者”和“親夫聖人者”這三個使用排比句式的、意義聯繫密切、結構相對並列的小段落。

《論學繩尺》卷四黃道深《郭林宗何如人》^[15]：

嘗觀林宗之為人矣：

名震乎京師，則京師知其為人矣；（筆者按：此為一脚）

才冠乎太學，則學校知其為人矣；（筆者按：此為一脚）

君厨俊及之名，錶表乎相高，則士君子又知其為人矣；（筆者按：此為一脚）

同舟之仙，衆皆望之。角巾之折，人皆效之，則匹夫愚婦亦知其為人矣。
（筆者按：此為一脚）

夫京師知之、學校知之、士君子知之、匹夫愚婦又知之（原評：結上四脚，文有法），則舉天下之大皆知其為人矣！^[16]

原評所說的“四脚”就是以上“名震乎京師”、“才冠乎太學”、“君厨俊及之名，錶表乎相高”、“同舟之仙”四個小段落，其段末“知其為人”是相同的。它們也是意義與結構相對並列的。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脚”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術語，是文章結構劃分的一個單位量詞，指一種具有並列意義的層次和結構形態。“脚”的具體含義近似於文章學中的“段”，但兩者又不太一樣。段通常是由數句組成的，而“脚”則可以是一句，也可以是數句。段與段之間意義是相對獨立的，而“脚”與“脚”之間的存在着並列意義的內在聯繫。

四

爲何叫“八脚詞”？從詞義來看，股就是大腿，“八脚”與“八股”意義是相近的。八股文和八脚辭都是指文章中間主體部分四對八段之意，畫龍點睛地指出了該文體獨具一格的特徵。^[17]

八股文從文體來看近於傳統文體中的論體，是對儒家經典的體會、闡釋和發揮。從語體來看，八股文綜合了中國古代駢散兩種語體：八比是駢體，而其它則是散體，由於八比是八股文的主體，所以八股語言的主體是駢體。但這種駢體與四六駢文又有很大的區別，它的句式又是散文化的，而不是四字句與六字句的組合。八脚詞對偶的這種特色，正是與宋代文章學中“脚”一語的含義相關的。

在宋代文章學中，“脚”與“脚”之間既意義獨立，彼此之間又互有關聯。“脚”與對偶相類，但又有所不同。對偶句是偶數句子，而“脚”却比較靈活，句數可偶或奇，可多可少。而且對偶句必然是句與句之間句子結構相似，但“脚”與“脚”之間，句式可以是相近的甚至是相同的。比如上引《論學繩尺》卷二黃萬裏《見知聞知如何》“三脚”。但也可以不同，像《論學繩尺·論訣》所說的“此雖兩脚，意不要偶，語不要齊。”比如《論學繩尺》卷四黃道深《郭林宗何如人》，四脚之中，前二脚一樣，

後兩脚不同。所以“脚”與“脚”之間的“排偶”，注重的是內在意義的並列關聯，而不是外在的語言文字形態整飭。“脚”與“脚”之間，可以是駢對，但不嚴格要求駢對，更主要的是意義上的。

再以《論學繩尺》卷五林駟《禹人聖域而不優》^[18]為例：

禹亦自知其不唐虞若也。

故其胼手胝足，其視垂衣拱手而天下治者為孰優？（筆者按：此為一脚。

原評：此兩脚先用禹事織堯舜事）

誓師振旅，其視不戰而屈人兵者為孰優？（筆者按：此為一脚）

擊壤之老，不知其帝力；康衢之童，不識而順則。其視六府三事，人得以歌其功者為孰優？（筆者按：此為一脚。原評：此一脚先用堯舜事來織禹事）

吁！堯舜之聖，其天也。若禹則其猶人矣乎！^[19]

以上共三脚，就是三個段末含有“孰優”段落，前兩脚的寫法相同，第三脚的寫法又有變化，但三段同樣是以禹和堯舜相比的。

與宋代文章學的“脚”相同，“八脚詞”的對偶是相當靈活的，可以比較嚴整，也可以非常隨意，我們以艾南英的《心之官則思》為例，其起首兩脚是：

是故：

耳之官在聽，而思其當聽與不當聽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聽與不當聽之理，遂了然吾前也。

目之官在視，而思其當視與不當視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視與不當視之理，遂了然吾前也。

這一二兩脚對仗是非常工整的。但其中股是：

當萬感紛紜，而天君內應，此時謂之心仍其官則可，謂之得思則不可。何也？百慮撞擾，未始不與衆交馳也。夫惟惺然者不昧，而後吾始能有思。而是思也，乃足以宰衆感矣。

當一事未形，而內自撓攘，此時謂之心仍其思則可，謂之非物交物感則不可。何也？獨睹中涵，未始不與衆俱疚也。夫惟洞然者無累，而吾始謂能思。而是思也，果足以杜衆誘矣。

三四脚的對仗已經不甚工整了。到了五六脚：

蓋耳目之役，以氣動也。心之思，亦以氣應也，均是氣耳。惟官在思而惕之以思，則以理馭氣，而行乎感應之途而無差。

耳目之官，於吾身為視聽之職也。心之官，於吾身亦腑竅之列也，均是形耳。惟官在思而宰之以思，則以性治形，而握乎明聰之主而不亂^[20]。

五六脚不但對仗非常不工整，連字數都不相同，實際上這是作者有意的追求。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明代“八脚詞”名稱的出現與宋代文章學影響關係密切，而且可以說，從形態上看，“八脚詞”也是受到宋代科舉文體的影響而形成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七《論學繩尺》一書提要謂：“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所言甚是。關於八股文的起源，歷來衆說紛紜，見仁見智。^[21]當然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認為八股文起源關係最為直接的是宋代的科舉文體。《論學繩尺》一書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宋代科舉考試文體對明清考試文體的影響。除了《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之外，《論學繩尺》中的“脚”對明代“八脚詞”的名稱和形式的形成也同樣是有影響的。明人把八股文又稱為“八脚詞”，正好透露出八股文與宋代考試文體聯繫的消息。

注釋：

[1] 以上引文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沈承撰、毛喬初評選《毛喬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另外，《古今圖書集成》之《文學典》第一百八十一捲“經義部”也引沈承《文體策》。

[2] 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297冊，第440頁。

[3] 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511冊，第792頁。

[4] 引自《中國野史集成》巴蜀書社，1993年，第37頁冊，第691頁，來新夏謂此書作者為王家楨，字予來。見《清人筆記隨錄》，中華書局，2005年1月版，第95頁。

[5] 凌義渠生平詳見《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五十三本傳。中華書局整理本，1974年版，第22冊，第6852頁。

[6] 清乾隆飯頤山房刻本，見《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出版社，1998，三輯，第28冊，第227頁。

[7] 參看拙作《儒學與評點之學》一文，載《華學》創刊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8] 《朱子語類》卷第九“學”三“論知行”，中華書局，1986年整理本，第148頁。

[9]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四《論語》六“為政”篇下“子張學干祿”章，中華書局，1986年整理本，第592頁。

[10] 中華書局，1986年整理本，第3322頁。

[11]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358冊,第84頁。

[12]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358冊,第87頁。

[13]此題出於《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14]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358冊,第159至160頁。

[15]此題出於《後漢書》卷九十八《郭太傳》:“或問汝南範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16]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358冊,第258頁。

[17]事實上,八股文的結構形態多種多樣,絕不是“八股”或“八腳”所能概括的。參見拙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增訂本)第十三章《明代八股文》第二節“八股文之形成及基本結構”。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56頁。

[18]此題出於《漢書》卷六十四下《賈捐之傳》:“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

[19]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358冊,第299頁。

[20]《欽定四書文·啓禎四書文》卷九,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451冊,第552至553頁。

[21]參見拙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增訂本)第十三章《明代八股文》第一節“從八股文起源諸說看其文體特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42頁。

明代“詩話”概念述論

上海大學 孫小力

根據目錄學四部分類原則，明清時期，詩話著作隸屬於集部詩文評類。然而詩文評類其實是從文史類演變而來的，朱自清曾說：

從目錄學上看……詩文評的系統的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於樸代。可是一向只附在“總集”類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為“詩文評”類。著錄表示有地位，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1]

在此“自成一類”、“有獨立的地位”的“詩文評”之中，詩話著作的“文學理論批評”色彩似乎最為澹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詩文評類小序，將有關著作分為考評文體、品評作家作品、陳述詩法、探究本事以及“體兼說部”等五類，詩話位列第五^[2]。

在清代乾隆時期的文人看來，“體兼說部”，正是“詩話”有別於其它詩文評著作的明顯標誌。也就是說，盡管詩話總體上屬於詩學批評理論著作，但又不是純粹的詩學理論。但是，我們不難發現，清代吳喬《圍爐詩話》、王夫之《薑齋詩話》和王士禛《帶經堂詩話》等等，內容似乎主要是說詩，又和“說部”沒有多少關係。南宋以後，詩話著作大量增加，在詩文評類中佔有相當比重，它的內容和性質的變化，無疑影響到相關著作的分類及其類目的命名。那麼，“詩話”與“說部”在歷史上究竟呈現出怎樣的關係變化？詩文評系統的著作何時從“文史”類演變成“詩文評”類？明人詩話的實際內容及其詩話概念又是怎樣的呢？搞清楚這些問題，無疑有助於今人對詩話著作的認識，有助於對古代詩學理論著作的認識和把握。

一 從書目分類看明代“詩話”的內涵

隸屬於《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之中的書籍，最早的產生於魏晉六朝。六朝之後，詩文評方面的著作不斷產生，而在書目文獻的著錄上，却遲遲沒能反映出

來。唐代初期編撰的《隋書·經籍志》，沒有給詩文評著作單獨設類，有關著作如摯虞《文章流別志論》、劉勰《文心雕龍》、姚察《文章始》等，都歸入了集部總集類。最爲根本的原因，應該是當時此類書籍還太少，不足以單獨設爲一類。甚至直到北宋的《郡齋讀書志》，仍然將《文心雕龍》雜置於“別集”類中。

不過到了北宋，詩品文評一類的著作已經產生不少，它們的分類歸屬，自然就會受到目錄學家的重視。將後來通常視作詩文評的著作單獨歸爲一類，並冠以“文史”名稱的，以北宋歐陽修負責編纂的《崇文總目》爲最早。《崇文總目》遵循四部分類法，“文史”類著錄了包括《文心雕龍》、《詩品》在內的二十五部著作，置於集部之末、“總集”之後，這二十五部著作中的絕大多數後來被《四庫全書總目》歸入“詩文評”類，其中除了《文心雕龍》、《詩品》之外，多爲詩式、詩格、詩句圖之類的書籍。而稍後編成的《新唐書·藝文志》，亦採用了“文史”這一分類名目，因爲是正史，對後世的影響顯然更大。

然而《崇文總目》編成於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當時歐陽修初創的以“詩話”命名的書籍尚未問世，故此書目的“文史”類之中，也就不可能有以“詩話”命名的著作。即使在詩話著作產生之後，或許是因爲數量不多，或許是因爲文人對詩話這種形式的著作尚不重視，北宋的書目文獻之中，並不見有詩話著作的著錄。直到南宋時期，詩文評類著作迅速增加，尤其詩話產生較多，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沿襲《崇文總目》和《新唐書·藝文志》的設置分類方法，將有關書籍置於“總集”之後，歸入“文史”類，而與《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有所不同的是，其中已經包括各種詩話和詩談。此後直至明末清初，這一著錄分類方法仍然爲衆多書目所仿效，例如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等等。

不過當時也有人不採用這樣的分類方法和分類名稱。南宋鄭樵《通志》就將書籍分爲十二類，與詩文評有關的著作歸於第十二類“文”，其中“文史”和“詩評”兩小類的相加，與後世的“詩文評”類接近。

至於明代有關詩話文獻的著錄分類，更爲多樣。筆者分析明代和清初的官方和私人書目文獻中有關詩文評書籍的著錄情況，發現詩話的分類和歸屬，大致有四種情況：

其一，按照書名編排，不作歸納分類；或者雖有分類，但是相當粗略，基本上是按照詩、文的不同而分別著錄，明代大多數的書目屬於此類。例如據稱由楊士奇負責編纂的《文淵閣書目》，將“集部”書籍分成“文集”和“詩詞”兩類，不再細分，而將“文評”性質的書籍納入“文集”類，又將詩話、詩談等歸入“詩詞”類。佚名所纂《近古堂書目》則有所改進，分別設有“文說類”和“詩話類”，但是著錄主要根據書名，較爲機械，具有詩話性質而未以“詩話”命名的書籍，就基本沒有納入“詩話